

东北沦陷史研究述评

车霖虹 辛 巍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75 周年,值此之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北沦陷史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不仅有助于此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还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史学研究,使东北沦陷史研究得以不断提高。

一 东北沦陷史研究发展阶段

(一) 东北沦陷史研究之初始阶段(1931 年~ 1949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国际舆论及中国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警觉。当时关内的一些作家和新闻记者深入到东北,发表日本侵略东北及东北沦亡日军制造侵略罪行的报道,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分析和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以及东北沦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流亡关外的东北爱国人士创办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由此形成此方面的著述和回忆录。东北沦陷史研究初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陈觉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①,该著深刻揭露了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称霸世界的阴谋和罪行,歌颂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至今仍为研究者广泛利用。

(二) 东北沦陷史研究之缓进阶段(1949 年~ 1979 年)。建国

^① 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 年出版。

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东北沦陷史研究的缓进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配合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日本在东北的统治与暴行进行了调查,积累了一批调查资料,但多数未发表。其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革命传统教育中,一些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老同志撰写了一批回忆录。第三,自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三省部分省直单位、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东北沦陷史研究成果除1951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伪满奴化教育》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的论文。中共地方党史部门也对日本侵略东北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三) 东北沦陷史研究之发展阶段(1979年~今)。20世纪70年代末,已停办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恢复和建立,以及东北各地省市县中共党史委员会、政协文史委员会、史志办、各大学院校历史系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东北沦陷史的工作。此外,一些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1980年成立的中国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进一步推进了日本侵华史和东北沦陷史的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北沦陷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学科并走向繁荣,一些优秀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东北史学工作者姜念东等的《伪满洲国史》^①一书,揭开了全面研究东北沦陷史的序幕。

198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东北三省合作组织“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中国东北沦陷史研究全面展开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十余年的工作主要分三个

^①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阶段：1986~1991年，其初期研究主要注重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同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科研论著；1991~1995年是其研究深化时期，陆续出版了有较高水平的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95年以后在对东北沦陷史进行综合及专题研究的同时，其重点转向实证性研究，注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特别是关注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

二 建国以来东北沦陷史研究主要论题及观点

建国以来东北沦陷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研究成果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曾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和东北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研究

大陆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确立其在东亚大陆的霸权，对该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政策，它是日本的最高国策，日本称其为“对华政策”。较早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有万峰的《日本近代史》^①，作者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非是“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大陆政策可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把向外侵略扩张作为其宗旨，将朝鲜和中国东北列为侵略大陆国家的首选目标。学术界对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日本对外侵略各阶段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赵冬晖《日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本推行大陆政策概述》^①一文将大陆政策分为形成、发展和进一步发展三个阶段并就各阶段的特点指出，1890年大军阀山具有朋提出的所谓“主权线”、“利益线”之说，奠定了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抢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日俄战争又从沙俄手中获取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这是大陆政策得以发展的重要步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回到东方进行争夺，日本帝国主义迫于国际形势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其大陆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大战期间的政治鲸吞转变为经济蚕食，这是大陆政策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而东方会议的召开表明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方面走上了最疯狂阶段。赵连泰《田中义一及其对华侵略的“积极政策”》^②，重点强调了1927年6月田中内阁成立后，其“强硬”外交路线取代币原的“协调”外交，从而加快了日本侵华的步伐，作者指出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现标志着大陆政策在20年代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所暴露出的日本侵略野心及其所陈述的侵略方策均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所证实。最新出版的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③是国内就此问题研究的一部专著，作者将大陆政策的形成、发展直至崩溃的历史分成4个阶段：即1890年山具有朋的“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的“满蒙分离论”；1937年近卫文麿的“国际正义论”和1942年东条英机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论”，4个阶段的阐述揭示了日本侵占东北、肢解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并得出结论，日本大陆政策的确立和

^① 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③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推行,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等战火的点燃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

《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就此展开了讨论,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肯定说^①,认为奏折“涉及内容之广泛、设想之详尽、计划之周密”,且历史事实证明从东方会议召开到1945年日本对外侵略失败为止,“日本完全按照田中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二是缺乏依据说^②,将日本所存资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东方会议确定了侵华政策,但田中奏折的存在缺乏依据,而由东方会议的内容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三是体现说^③,指不论田中奏折真伪,1927年以后日本采取的对华侵略行动,体现了日本侵略者的扩张意志和侵略野心,历史事实与《田中奏折》的总规划如出一辙,其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深信不疑,道理即在于此。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东部及原热河地区,即日本侵略者所说的“满蒙地区”,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及苏联远东地区地阔物博,资源丰富,早为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占领朝鲜和东北地区可北攻苏联远东地区,染指欧洲;南下中国腹地,可以控制南亚地区。因此,日本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后,即将其作为日军军事战略物资供应基地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而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以东

①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云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俞辛焞:《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载《南开学报》1985年第1期;邹有恒:《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载《中日关系史论集》,1989年。

③ 章伯锋:《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北为基地实施的“南进”和“北进”政策在推进大陆政策过程中尤显重要。李茂杰《论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我国东北沦陷区进行对苏进攻准备的问题》^①认为,日本自1931年9月武力侵占东北以来,从积极制订对苏作战计划、连续进行军事试探并加强在东北进行综合性军事基地的建设,到关特演(关东军特种演习)对苏进攻准备达到高峰为止,是日本对苏进攻“北进”政策实施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积极实施“北进”政策。由于张鼓峰和诺门坎日军两次对苏军事试探的失败及它所期待的欧洲战场有利的形势没有到来,日军将主要注意力放在首先夺取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方面,进而实施“南进”政策。诺门坎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苏军与日军的武装冲突事件,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是长期以来日本大陆政策与苏俄远东政策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日苏从“静谧”到对抗关系的典型事件。诺门坎战争以关东军的失败而告终,而此时日本并没有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和准备,但主张“南进”的势力占了上峰。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②指出,法西斯德国侵占欧洲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急剧膨胀,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德国侵犯苏联,日本急欲向东南亚扩张势力,夺取那里丰富的物质资源,确立了南进政策,最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而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大陆政策彻底崩溃。

(二) 围绕九一八事变问题的研究

关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机的选择及国内历史背景。沈一言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③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

^①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生除日本国内自身来说有其经济根源政治因素,即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而从侵略中寻求出路外,从被侵略的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日本抓住了当时中国三个方面的主要政治力量,即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张学良的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国处在分裂状态这一时机。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①,就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国内背景指出,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二是国民党政府采取投靠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对内诛除异己、屠杀人民的反动政策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计划能够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②一文指出,中国的分裂状况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日本正是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现状推行它的侵华政策。中国分裂的现状不单体现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蒋介石除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先决条件外,主要是想通过“安内”来巩固他在中央的集权地位;而共产党方面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直以“抗日反蒋”作为其基本政策方针,由于中共经常处于国民党围剿的位置,在“抗日”与“反蒋”之间,后者占有支配地位,因此,这种分裂现状直到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战爆发才有所改变。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以往学术界分析研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多将其视为妥协投降的代名词。在日本侵占东北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认为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妥协投降政策。近年来学术界对“攘外必先安内”所经历的复杂演变过程提出了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黄道炫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

① 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内”方针研究》^①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熊宗仁《“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②一文,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将“攘外必先安内”确立为基本国策,通过以“剿共”为中心的“安内”,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的分析,指出“攘外必先安内”不是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或基本准则,只是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是图存御侮的策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通行的传统说法是,张学良被迫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魏宏运《“不抵抗主义”剖析》^③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几次电令张学良东北军,对日本军队避免冲突和不作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包含对内对外两个含义,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国内人民的抗日言行采取镇压扼杀的手段。张学良接受和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结果导致了东北的迅速沦陷。关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根由,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④认为,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第一,不抵抗主义根源于蒋介石所谓“三日亡国论”的民族失败主义;第二,它来源于所谓“以公理战胜强权”的依赖外援论;第三,它来源于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心理;第四,它来源于牺牲东北论,即蒋介石集团以牺牲东北地区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不损害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载《文史哲》,1987年第2期。

^④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该集团利益的保证。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和质疑,曾景忠《张学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说真实可信吗?》^①一文提出以下质疑,一是东北易帜后东北当局对于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东北当局很难说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二是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指示张学良对日“力避冲突”与事变后实行不抵抗方针应有所区别;三是事变当夜东北军荣臻、王以哲等请示张学良,是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而蒋介石不可能下达不抵抗命令;四是在处置九一八事变方针上,蒋介石与张学良有所区别,国民政府方面除诉诸国联外,有准备抵抗之内容。我们认为,在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问题上,力避冲突也好,不抵抗主义也好,均反映出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主观上抗日决心不够坚决,对日本抱有幻想的一面。

关于策划九一八事变是否代表日本国家意志、是否是由于关东军“独断专行”即所谓“独走论”的问题。“独走论”在日本学界影响较为广泛,日本有人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我国学者则多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精心策划的侵略事件,关东军仅仅是执行的工具而已。针对日本有将战争责任加于日本关东军而开脱日本政府战争责任问题,郎维成认为,战前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因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才“决定采取先由军部发动,然后由政府承认的方式”,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针对日本国内制造“独走论”所持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昭和天皇不亲政,是“虚君”,是“和平主义者”的说法,郎维成进一步指出,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认为日本战败前夕,天皇与其近臣策划了为维护“国体”而

^①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九一八事变70周年论文集》,2001年。

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编造了军部、关东军“独走论”。^①

日本关东军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②针对有人把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归咎于中国“外部压力”说指出，并不是中国的“排日”和“压迫”给日本造成什么“满蒙危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地位陷于“动摇”，而是日本变本加厉步步进逼不断加强扩张和掠夺活动，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和准备活动概括为：制造侵略舆论；策划政治阴谋；扩军备战；制造进攻东北借口。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肇始地点柳条湖，长期以来被误作“柳条沟”。徐建业、王维远《九一八事变肇事地名考》^③，经过作者实地与档案考订认为是柳条湖，其所以被讹传为“柳条沟”，系因事件发生当天日方电讯稿误传所致。这一重要史实的考证对于九一八事变研究起到去伪存真拾遗补阙的作用，因战后以来在中国和日本方面的有关著述中，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肇始地在此考证之前“柳条沟”一词存在很长时期。

九一八事变是否可以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七七事变说和九一八事变说。七七事变说是迄今为止史学界流行的传统观点，其主要依据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国内的阶级矛盾，七七事变后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才真正开始。九一八事变说是 80 年代以来较有代表性的新

^① 《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独走论”再评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 载《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观点，其主要理由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对传统的“八年抗战”提出了异议。^①近年来史学界又提出把抗日战争分为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的观点。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三)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的中日关系，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②将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本外交与同一时期中国南京政府的外交对策结合起来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因战争性质决定了日本外交的失败和中国的最终胜利。该书围绕着九一八事变前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问题的日本外交特别是外务省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对该时期中、日及国联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极为透彻，作者提出了九一八事变初期日本、中国和欧美列强的外交关系均持有双重外交的观点，日本的双重外交围绕着扩大与不扩大战争，在外交方法、手段上存有差异，但在维护日本帝国主义权益方面是一致的，其双重外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列强的双重外交，有默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面，也有为了同日本争夺中国、利用中国抵抗日本的一面，其结果使得中国获得反侵略的支持和对日本侵略的限制都显得无力；南京政府对列强的两重性采取了两面对应的政策，利用列强与日本对抗、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的一面来解决九一八事变，而对列强与日本妥协绥靖的一面则以温和的方式加以反对。

^① 何英：《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载《延安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王维礼：《论抗日战争的开端》，载《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② 日本东方书店，1986年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京政府因对外交涉的迫切需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临时性外交决策机构，以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问题为中心，讨论决定外交方针、外交策略和外交事务。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确立的直接处理方针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诉诸国联，希望通过英美法等国的干涉使日本撤兵，与日本不绝交，不宣战，也不进行直接交涉。此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主要围绕对苏复交及外交重点是联苏还是联英美的问题，随着对英美外交的屡屡受挫，与苏联接近渐成南京政府面对现实的选择。以往关于 1932 年的中苏复交，研究者多认为是国民政府联苏制日政策所致。鹿锡俊《1932 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②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国民政府在整个对苏复交决策过程中，担心联苏会给日本强化侵略提供借口，失去英美等国的支持，最终决定无条件复交，主旨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作者认为蒋介石的外交战略是联英美，制苏日，“以苏制日”不等于“联苏制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和苏联的安全都构成了威胁，苏联政府虽表示同情中国，“提议中苏应立即复交”，但却明确宣布对中日冲突采取“严正不干涉”政策，随后多次向日本谋求缔约，对此日本不仅给予拒绝而且加紧了对中东铁路的侵犯。苏联从 1932 年开始就表示愿意出售中东铁路，1935 年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将中东铁路以低价出卖给“满洲国”，实际是日本政府，反映了苏联迫切希望获得对日缓和的意图。关于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一书指出苏联政府和人民是同情

^① 载《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和支持中国，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的；而步平《试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国际关系》^①一文则认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远东军事力量单薄，苏联虽表示了谴责日本的态度，但又怕日本的战火烧到自己而与日本妥协，其实行的国际主义是不彻底的。

苏联对中日冲突实行中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以及后来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王真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和《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②指出，苏联鉴于30年代初远东局势的复杂性，新生苏维埃政权历史不长，国力尚不强大，为避免直接卷入中日冲突而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其实质是一种妥协，而妥协只是苏联采取的策略而已；对于苏日中立条约，作者认为苏联为了远东边境的安全和应付紧张的欧洲局势同日本订立中立条约的策略是正确的。作者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角度来肯定条约的合理性。针对上述观点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苏方借中立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主动提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保证，这是苏联在原则上的大倒退，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条约的签订切断了日本进犯苏联的通道，促使日本南下的意图，是为本民族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③孙才顺在《如何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的是与非——论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④指出，抗战时期困扰中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苏两国的利益冲突，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严重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中立条约以承认“满洲国”换取了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粗暴

①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③ 黄定天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载《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④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苏联对中国的可耻背叛。

关于英美法德几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姜念东等人的《伪满洲国史》指出,九一八事变前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因严重经济危机,无力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虽然他们在掠夺瓜分中国上存在着利害冲突,但同时也企图牺牲中国东北领土主权来讨好日本,使日本充当远东反苏反共的先锋。胡德坤的《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认为,美国始终采取绥靖政策;而易显石的《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一文,认为美国的态度有从观望到对抗的变化过程,当日本侵占锦州危及它的在华利益时,美国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给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①陈锦骍的《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不偏袒”方针》^②将美国的态度以日军攻占锦州为线分前后两段,指出虽然前后态度有所调整,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对日交涉,但以后的方针仍未越出事变初期绥靖日本的模式。就英法德国的态度研究者指出,他们始终是消极观望,无视中国的呼吁和请求,甚至迎合日本意愿纵容和袒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决定成立调查团赴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对国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全面依赖国联,而日本则采取敷衍和欺骗的办法,致使日军最终全面占领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国联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虽然通过了有利于中国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对日军的军事行动有过牵制作用,但未能采取实际行动来阻止日军的进一步侵略。1932年10月李顿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一方面反对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又认为不能将东北恢复原状,同时又提出一个“国际共管”方案,企图变中国东北为其共

^① 《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载《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② 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同统治的殖民地。步平《试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国际关系》认为,报告书中确实带有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但明确指出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性质,东北是中国领土并否认伪满洲国,这些认识和结论对中国是有利的。以往研究者对当时由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把持的国际联盟审议李顿报告书,就英国的态度普遍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退出国联,英国当局基本上采取袒日的政策,而张北根的《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①认为,英国为其远东政策即维护和扩展在中日的贸易利益和避免对日战争,对李顿报告书的审议态度经历了从袒日抑中、对日让步到基本主持“公道”的变化,最终促使国联通过了关于李顿报告书的决议,日本为此退出国联,中国赢得了道义的胜利。

(四)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政治统治及综合研究

对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始末进行完整系统的叙述和论析的专著有姜念东等人的《伪满洲国史》^②,该书作为一部开拓性学术论著,利用大量首次披露的国内外有关档案及史料,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为主线,阐述伪满傀儡政权的出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殖民过程,以及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傀儡政权的覆灭。该书在阐述伪满国家机构时突出其特点是“次长制”,关东军是伪满的最高统治者,体现出殖民政权的重要特征。另一部通论性著作是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③,该书内容丰富,叙述全面,梳理出伪满洲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作者集十多年来此方面研究成果,在史料发掘和史实阐述上均有创新和突破,把伪满洲国从纵的历史进程与横的社会各层面有机地结合起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来,除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的政治压迫,还着重揭露了经济掠夺和思想文化统治,将伪满洲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王承礼等主编的《苦难与斗争十四年》^① 3卷本长篇著述,是关于东北沦陷历史的总结性研究成果。该书以日本侵略东北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以及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主线,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其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谴责了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讴歌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关于日本在东北殖民地政治统治的专题研究,王希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②一书,从政治统治角度分析了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特点,阐述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以及“王道政治”愚民奴化政策,对具备法西斯政党性质的“协和会”在贯彻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张辅麟的《伪满政权面面观》^③,剖析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揭示了伪满洲国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其实质完全是日本的殖民地,关东军的掌上玩偶。关于基层统治,车霁虹的《伪满基层政权研究》^④总结归纳出伪满基层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把伪满基层政权与东北旧的封建基层统治制度、伪满警察制度、日本国基层组织及日本在其他殖民地建立的基层组织的比较,揭示了伪满基层政权的实质及其罪恶。

(五)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

东北沦陷时期经济研究包含丰富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如日本

① 王承礼等著:《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② 王希亮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 张辅麟著:《伪满政权面面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④ 车霁虹著:《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对东北经济掠夺、日伪经济统制政策、日本向东北移民、东北沦陷区金融交通等。其中对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形态及其性质特征的研究首推东北经济学家孔经纬的《东北经济史》^①,该书对东北沦陷时期经济作总体概述,指出1934~1935年是殖民地经济初具规模阶段;1935~1937年殖民地经济得到初步扩展;1937年以后是殖民地经济达到极度畸形膨胀的阶段。王希亮在《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形成深化及其特征》^②一文中认为,伪满的经济完全是服务于战争和宗主国需要的畸形殖民地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深化大体分两个阶段,一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制订和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建立和强化殖民经济体制的时期;二是从七七事变到伪满垮台的“战时经济体制”时期,日本疯狂掠夺战争资源,采取“杀鸡取卵”的手段,使东北经济濒于崩溃。步平的《日本殖民地经济问题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北殖民地为中心》^③一文,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活动同其他殖民地台湾、朝鲜等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既阐述了殖民地经济的共性即殖民地经济是日本经济政策的延伸和延续,殖民地经济被置于日本经济的从属地位,同时也说明了日本同东北殖民地所具有的特殊关系。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机构和经济垄断组织。从1906年到1945年,满铁在中国东北从事侵略活动达40年之久,对满铁史的研究是东北沦陷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首部系统而又全面论述满铁的专著

① 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③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当属苏崇民的《满铁史》^①,该书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指出九一八事变前的26年为满铁的经营阶段,为东北沦陷后满铁的发展打下基础。作者认为,在东北沦陷之前,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早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及其向全东北扩大侵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基地,正是满铁的侵略使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统治中国人民的经验,为日本全面统治东北14年作了充分的准备。1937年以后为适应战时经济体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是继“满铁”之后又一个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重要经济侵略机构。郑敏《日本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②一文,论述了“满业”成立的背景及作用,指出随着日本战争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在伪满洲国能获得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成立“满业”,标志着日本军阀与财阀相互勾结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的开始。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日本帝国主义从1905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中国东北,直到1945年投降。关于移民史研究,日本方面的研究著述颇多,出版数量较大,而中国对日本40年的移民史研究相对薄弱。上世纪80年代,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姜瑞起等《日本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③。针对191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最早实验村“爱川村”的分析研究,指出以“爱川村”为代表的日本早期移民虽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但它给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侵略活动积累了经验,对以后的武装移民

^① 苏崇民著:《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②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③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产生了重要影响。左学德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①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和研究日本移民东北历史的专著,该书对已发表的现有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订正和补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经过 1932~1936 年向中国东北共进行 4 次武装移民的“试验期”,取得移民侵略的经验后,制订“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作为日本国策,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而强化移民侵略机构,实施“分村分乡”移民运动,使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统治直接深入到我国东北广大农村,移民侵略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变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野心。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不是单纯的经济移民,也不是为了促进“满洲现代化”,它给广大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于日本移民东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往研究者更多的重视和强调东北农民失去土地,受到剥削压迫的一面,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的损失,关伟、关捷《日本“满洲移民”诸问题之探讨》^② 则认为,日本武装移民除了给东北人民造成流离失所,遭受肉体折磨外,精神损伤更为严重,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企图在中国建立“第二祖国”的日本民众带来灾难。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日本移民提出了“被害”和“加害”的问题,孙继武、郑敏主编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③ 指出,日本移民大多是贫苦农民,由于侵占了中国的土地,奴役和剥削了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客观上他们是加害者;但是日本移民大多是被欺骗强征和生活所迫来到中国,用来镇压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生产粮食和充当炮灰,他们又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

① 左学德著:《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孙继武等著:《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害者。

(六) 关于日本在东北暴行的研究

日本在东北暴行这一专题的资料性及研究性论著较多。由东北沦陷十四年编委会总编室组织编写的《日军暴行录》^① 是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日军在东北暴行的力著，百余万字的三卷本分别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犯下的烧、杀、淫、掠等种种罪行，包括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大讨伐”、“大屠杀”、“大逮捕”及苦难的劳工与“万人坑”，构成一部日本侵占东北的血泪史，体现出日本统治东北制造暴行血案的三个特点，一是时间长；二是屠杀镇压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三是血腥屠杀的手段极其残暴毒辣。

近年来，学者们对东北劳工问题予以关注。《劳工的血与泪》、《伪满劳工血泪史》、《劳工血泪史》等^②，揭示了日伪劳动统制政策下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东北工人阶级迅速扩大是与日本掠夺东北战略资源、进行“产业开发”有密切联系的。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期间诱使大批华工进入东北，在战时劳务体制下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和对劳工的奴役和压榨。居之芬的《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③一文指出，1936~1945年间，日本从华北贩卖强征劳工人数704.7万余人，其中掠往东北的劳工677.9万余人，在日军及日伪当局的残酷奴役下，劳工的生活极其艰难，命运相当悲惨。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② 苏崇民等著：《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佟杰主编：《劳工血泪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天义著：《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而使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更是残忍和非人道的。众所周知,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践是以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日军七三一部队为中心进行的。韩晓等《日军731部队罪恶史》^①是国内较早关于研究日军七三一部队的专著之一,该书指出日军用活人进行各种试验至少有3000人被杀害,为全面了解七三一部队提供了难得的证据。辛培林的《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②一文,对细菌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认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16~1933年是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此期间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鼓吹,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及防疫研究;从1933~1939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大规模实验阶段,此期间祸移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和繁殖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1939~1945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实战阶段,此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均已完全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在诺门坎、宁波、常德等地陆续使用了细菌武器。此外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解学诗等的《战争与恶魔——731部队罪行考》、郭成周等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③等,从不同角度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并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细菌战的研究虽然取得许多成果,但还需扩展研究范围,除七三一细菌部队外还有位于长春的日军一〇〇部队等需要深入研

① 韩晓等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③ 《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战争与恶魔——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究。我们相信,随着最近几年来档案资料“特别输送”被陆续发现,细菌战的研究将会不断深入。

化学战也称毒气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一支与七三一细菌部队性质相同,以化学战研究、活人人体实验为目的的化学部队——日军五一六部队。日本在中国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在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化学战罪行被有意掩盖,日方一直否认其化学战的责任。在对东北沦陷史研究中,步平等通过对日军侵略东北罪证调查,发现了遗留化武及其对中国平民伤害问题,遂从 90 年代起对日本化学战的情况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在日本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寻找证据、证人,其《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①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把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推向了国外,同时得到日本方面追究日本旧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责任的进步学者的支持。调查研究证实,在中国有近 3000 人受到日本遗留化武的伤害。对于侵华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在失败溃逃之时把大量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的领土,从而在战后造成无数起伤害的历史事实,《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②一书,对史实,特别是对集中埋葬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描述。

(七)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

张学良研究是东北沦陷史研究中必然涉及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有关张学良的传记、研究论文及纪念回忆文章多有问世。学术界一般认为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这是对他一生的总评价,而对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敌手一事,有人认为张应负责任,

^① 日本明石书店,1995 年出版。

^② 步平等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如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认为，张学良接受和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当局的混乱局面，以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因此张学良对于东北沦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生杰等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①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对于东三省丢失负有历史责任，但从根本上看张学良不失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将领，他组织和领导了对日军的局部抗战，支持事变后流亡关内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义勇军的活动，同时受救国会和义勇军的影响逐渐坚定了抗日决心和信心，为他以后政治态度的历史性根本转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人物研究中学术界对马占山降日问题产生过争论。马占山在日本占领辽吉两省大举进军黑龙江之际于江桥抗战失败后曾一度降日，不久又举兵反日。对于降日，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真降说^②，认为，马占山一度降日只是留在他身上的一个历史污点，并不影响对他整个一生做出肯定评价；二是伪降说^③，认为马占山之举是伪降即“缓兵之计”，但此举是“毫不足取的”。

在日伪人物研究方面，对溥仪的研究较为集中。王庆祥的《溥仪传》、于友发的《由皇帝到公民》等^④认为：虽然通常说法认为溥仪是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到东北的，但其中存在着溥仪与日本相互利用的一面，日本利用溥仪充当殖民统治东北的傀儡，而溥仪则利用日本达到其复辟的目的；在日伪 14 年殖民统治东北时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常城：《马占山》，载《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于德有等：《关于马占山一度降日问题》，《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刘邦厚等：《评马占山的抗日活动》，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

④ 《溥仪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由皇帝到公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期,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亲手“裁可”了数以百计的敕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是民族的罪人。然而作为日本傀儡,他与日本主子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最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

李侃的《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①一文中,透过郑孝胥借助帝国主义复辟清王朝活动这一悲剧式结局,让人们看到伪满洲国的出笼经过及其傀儡性质;锡光《张景惠其人其事》^②,对张景惠这一人物卖国降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揭示了张景惠的汉奸嘴脸。汪朝光的《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③,指出伪满政权的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员,认为有留日经历和接受过军事教育的伪官员占相当比例,反映出日本通过留学生教育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八)关于东北沦陷区社会及文化教育问题的研究

辛培林的《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社会形态》^④指出,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畸形的殖民地化社会形态,它不是在东北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产物,而是在日本野蛮的武装占领和残酷的统治之下通过实行一系列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和措施制造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封建经济关系依旧存在并有所发展,二是城镇各行业迅速殖民地化,殖民地社会形态导致东北社会极端黑暗、腐朽,烟馆、妓院、赌场遍地,流氓、盗匪、黑社会势力猖獗,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造成的。李淑娟的《日伪的鸦片毒化政策对东北农村社会的影响》^⑤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③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载《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⑤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指出,日伪鸦片毒化政策作为一种特殊武器和精神麻醉战略,其影响渗透到东北农村社会的每个角落,由于日本侵略者认为鸦片既是傀儡国财政的重大来源,又是麻醉东北人民的最好办法,故极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从1933年的鸦片专卖到1938年采取的所谓鸦片断禁政策,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撕掉禁烟“遮羞布”后,烟禁大开,农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大片粮田变成烟田,使东北农业结构发生了畸形变化。烟毒泛滥,社会道德和风气败坏,吸食者身心受到摧残和破坏,丧失了民族意志和反抗斗志。

关于文化方面,吕元明的《论伪满的文化》^①一文记述了日本统治东北14年对东北文化实行的广泛而又全面的专制与垄断,以及疯狂镇压东北爱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罪行,讴歌了文艺界与白色恐怖进行的不屈斗争。郭君等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②,阐述了日本对伪满新闻报业的高度垄断,指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新闻报纸摧残和麻醉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它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号角和工具。冯为群等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③一书,论述了东北沦陷时期东北作家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反日爱国的文学活动,记述了抗日文化在斗争中的发展。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赵家骥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④一文,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实行殖民主义教育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歌颂了沦陷区反对殖民教育的斗争。一些专著^⑤

① 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

②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1988年。

③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④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1988年。

⑤ 王野平著:《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卢鸿德著:《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齐红深著:《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在教育界推行奴化教育的罪行。研究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奴化教育是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而逐步加深的,“新学制”的颁布彻底破坏了东北原有教育制度,强化日本语学习则是日伪当局淡薄民族意识,培养日本统治集团的忠实奴仆。以往研究者在论述伪满殖民地教育问题,多把研究重心置于学校教育上,而忽视了日伪殖民地社会教育,日伪统治者把奴化民众的社会教育视为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大事,不仅提出进行社会教育的根本方针和法规,而且建立了社会教育机构和设施,如民众教育馆、民众讲习所、图书馆、博物馆等,以达到欺骗、愚弄和奴化东北人民的目的。

孔凡岭《伪满留日教育述论》^①指出,伪满推行奴化教育过程中通过派遣大批青年赴日留学是奴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不在于学习日本的文化科学,而在于使中国青年接受日本思想精神文化的全面熏陶,以彻底“日化”,世代甘为日本的奴隶。

三 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东北沦陷史研究首先在史料收集、队伍建设、研究成果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是东北沦陷史研究的一大成绩之一,尽管此方面的日伪资料在日本战败后基本销毁,但学者们还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资料、回忆录等,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这一历史有了较为清晰、准确的描述。其次,对于东北沦陷史开展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出现和形成重点和热点问题,这无疑反映出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一批学术论著填补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了史学空白,一些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有了进展和重大突破。三是加强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并为现实服务。近十多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者广泛开展了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多次举办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抗战胜利学术研讨会和数届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对中日双方的研究都起到推动作用。

近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而是扩展到对战后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形成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日本政治右倾化及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或由教科书公开篡改历史,或由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或由“学术团体”的学者撰文,形成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逆流。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以至战争结束后直到今日,日本对亚洲各国民间受害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俘劳工问题、细菌化学武器问题、重大惨案暴行、经济掠夺等等问题未能澄清和彻底解决,因而形成了战争遗留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的热点往往与现实的问题相关,比如化学细菌武器伤害问题,劳工问题,由于日本移民侵略东北在战后形成的“在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问题^①等等,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课题。

东北沦陷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与国外特别是日本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应当承认,有些问题探讨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猎,一般化的学术重复劳动较多,缺少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和富于创新并有独到深刻见解的论著,这是其一。其二是东北沦陷史口述资料的挖掘和抢救工作开展不够。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政协文史办做过大量工作得到了珍贵的口碑资料,但就

^① 关亚新、张志坤:《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某些专题来讲没能进一步持续开展起来,这方面的工作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缺憾。第三,在实证性研究上略显不足。尽管此方面工作已得到开展,研究者经过深入实地,去伪存真,反复认证,掌握比较确凿可信的实证资料,但这样的工作不是全面的,还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调查。进行实证性研究对于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适应国际斗争需要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有重要作用,因此对于东北沦陷史研究任务还很艰巨。

(作者车霁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辛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馆员)

(责任编辑:柴维木)